

長風文庫

論魯迅的思想

平心著

長風書店出版

長風文庫

論魯迅的思想

平心著

長風書店出版

長 風 文 庫
論 魯 迅 的 思 想



代 售 處	經 售 處	發 行 者	出 版 者	著 者
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	正 風 書 店	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光 明 書 局	上 海 九 江 路 二 一 〇 號 四 〇 五 室 長 風 書 店	平 心

版 初 月 三 年 十 三 國 民

自序

偉人們在死後比生前容易被人了解，也容易被人曲解，那差不多成了歷史通例。一千五百年前，晉朝猛將劉希樂說過一句名言：『大丈夫蓋棺事方定』；然而對於死去的『大丈夫』了解的有人，曲解的也有人，就可知『蓋棺論定』說未必完全可靠。那理由並不難明白：對於人的評價，自來就不是單單以被評價者的死來做最後界線的。人當活着的時候，是社會動物，常識早已這樣告訴我們了，但某一個『社會動物』倘在人間留下了巨大影響，他的成敗功罪是非，榮辱卻也並不因為他的死而泯滅了。其社會意義，一切這些，照例由歷史結算在他生前所代表的社會階級的流水帳簿上：他將永遠被人們從各自不同的階級地位，時代需要和觀察角度來衡量，來褒貶。若要舉實例來說明，孔子就是值得提起的歷史人物。這個被尊為『萬世師表』和被封為『素王』的『聖之時者』已經死去二千四百多年了。但關於孔子，不是在各個時代和各個人羣中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麼？且不說最早儒墨道諸家對於孔子的臧否，就拿晚近的中國思想史來看：在清末，提倡政治維新的康長素把孔子捧做教主，而高唱種族革命的章太炎

則把孔子譏爲『國愿』（雖則他仍然頌揚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功績。）一到五四時代，就一面有以吳虞、錢玄同等爲代表的『打倒孔家店』，一面有以林紓、王敬軒等爲代表的衛道大家痛斥『詆毀先聖，蔑棄聖書』的『妄人』。看看最近的文壇和藝壇，關於孔夫子，又有議論紛紛的評價了。在曲阜孔德成先生由『衍聖公』改稱爲『大成至聖先師祀奉官』已歷六寒暑的今天，孔子仍然成爲一個問題中的人物，這就連善于『推進化之理』、『預知後世』（康有爲語）的『大成至聖先師』自己也料想不到吧。

論者曰：孔子去今太遠，近人對於他不能得到一個統一的評價，那原是不足怪的。但人們對於去今未遠的先哲，又何嘗容易作出一致的論斷呢？被尊爲中國人民國父的孫中山先生，死去只有十六年，然而把孫先生當作孔孟道統的繼承者有人，把孫先生當作馬克思主義的駁倒者有人，把孫先生當作社會主義運動家的有人，甚至把孫先生當作『東亞新秩序』的首倡者也有人。自然，除他們的論點而外，我們還看到另外一種解說中山先生的主張，那就是認爲這個巨人是中國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偉大導師。關於中山先生的論斷，是如此複雜而紛歧，這在善于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人，是原不必以爲不幸的。

另一個去今更近的先哲魯迅先生，活着時被人迫害了，侮辱了大半生，然而一到他死後，連原先迫害過他侮辱過他的『正人君子』和『紳士淑女』也化敵爲友，起來尊敬他，頌揚他了；是故意表示他們的大度呢？還是『謬託知己』藉以自銜呢？我不得而知，但無論如何，我們由此看到了一些特種的『兩面份子』的真實嘴臉，他們用一副面孔去對付活着的死敵，用另一副面孔去對付死去的死敵。他們不僅擅長于面孔變化的藝術，也善于畫歪敵人的面孔。他們連同那些以踢死獅子爲榮的男女勇士，用着不同的手法把魯迅化爲謔畫中的可笑人物。長眠在萬國公墓的魯迅不能張口，也不能執筆，當然奈何他們不得。可是，魯迅的武器並沒有帶進墳墓裏去，他遺留下來的那座思想武庫不在萬國公墓，而屹然聳立在人間。讓我們從這武庫中取出魯迅的武器，和魯迅的敵人潑刺戰鬥吧，讓我們的敵人在這鋒利的武器面前繼續發抖吧！

我們不應奢望一切都起來尊崇魯迅。生活在不同社會圈子內行走，在不同歷史道路上的人，對於魯迅各有各的褒貶，各有各的愛憎，那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。假如魯迅死後只是被人尊崇，而不被人侮辱，只是被人熱愛，而不被人痛恨，試問魯迅的精神何在？試問社會鬥爭的真理何在？

在現代中國文人中，沒有誰像魯迅那樣在羣衆中間享受真誠的崇愛，也沒有誰像魯迅那樣從敵人方面遭到切齒的憎恨。世人對於他的愛憎分明，正是他自己對於世人的愛憎分明的真實反映。但這愛憎斷不是超于是非之外的。凡愛憎，一離開真理的尺度，不過是一塌糊塗的混沌。倘有人從混沌出發來衡量魯迅，不管其動機如何，根據魯迅的精神，他都應歸入被憎之列。

當魯迅活着的時候，和我們一同行進，一同戰鬥，在血肉相連中；大家甚至忘記了他的崇高和特異。在那時候，人們對於他的思想和藝術，是享受多于研究，欣賞多于學習。但是，突然間，我們失去了這個公衆的導師，我們痛感到，他留下的空位是無法填補的，而他的偉大也就被更多的人和更深的心所記憶，所認識。在苦難中，大家想到了他；在戰鬥中，大家想到了他；在疲困中，大家又想到了他。從他離開我們以後，人們都說，他的死是不可補償的鉅大損失，但爲什麼不積極地說，他的不死是民族光明的偉大泉源？對於這泉源，我們還是滿足于享受和欣賞呢？還是進一步去研究，去學習呢？

展開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的運動，並且使這一運動不斷深入，這就是我們當前的革命任務之一。我們一定要補償由魯迅的死所造成的鉅大損失，不管花多少代價，費多少年月。

值得欣幸的是，在這四年間，對於魯迅的遺產，正有不少戰士在那里熱烈發掘和鑽研。雖說在這一方面的收穫還很有限，但只要不斷發掘下去，鑽研下去，任何一點一滴的成績，都有助於中國的歷史變革，那是確然無疑的。

但魯迅的遺產是屬於中國人民大眾的。潛心于魯迅的思想和藝術的深刻研究，固然異常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根據魯迅的精神來教育大眾，鼓勵大眾。倘有人認為大眾不配和無力接受魯迅的遺產，而要把這份遺產凍結起來，窖藏起來，還自命為得魯迅的薪傳，這樣的人不過是魯迅的叛徒，因為他連魯迅的基本精神都給否定掉了。

然而，魯迅的基本精神是否定不了的，被否定的，將是一切曲解魯迅反對魯迅的大眾敵人和革命叛徒。

一面是對魯迅嚴肅的學習和研究，一面是對魯迅無恥的曲解和侮蔑，這正是今天中國文化上的重要矛盾現象之一。因此，繼承魯迅事業者的責任就更重大了，他們不僅要學習魯迅，研究魯迅，宣揚魯迅，而且要忠誠地勇敢地保衛魯迅。

保衛魯迅的困難，不在於打擊對於魯迅的曲解和誤解，防止魯迅被人當作化石來利用，因

爲魯迅的精神和思想本身就具備了抵抗這類橫逆的堅強甲冑。凡「宗旨皆在可否之間，議論止於函胡之地」（章太炎評孔子語）的歷史偉人，最容易被人尊崇，但也最容易被人利用，最容易被人歌頌，但也最容易被人糟蹋。魯迅卻不是這一類的偉人，他的思想和主張是如此具體而明澈，使任何妄想利用他來達到自己卑鄙目的的人，都不能不望而却步，這是一切魯迅的衛士應當引爲光榮的。但困難的是，魯迅及其事業在生前受到迫害，在死後仍不免于此種命運，因此，倘使魯迅的衛士沒有勇氣抵抗摧殘魯迅精神和魯迅事業的逆流，踏着魯迅的足印：「敢說，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咀咒的地方擊退了可咀咒的時代」他就應當自動繳械，交給別的戰鬥者。

保衛魯迅，和保衛中國人民，保衛中國革命，是不可分開的。

然而，保衛者如果不同時是發展者，是不能取得勝利戰果的。倘說，進攻是最好的防禦，則發展就是最好的保衛。魯迅的全部遺產是歷史的產物，這產物也唯有在歷史的變革運動中纔能不斷豐富，不斷更新。祇有庸夫俗子對於這偉大文豪，纔以尋章摘句爲滿足，魯迅一生的思想和藝術都在經常發展中，他死後，發展他的遺產的責任，落在一切前進文化工作者的肩頭。在他的

鉅大遺產面前，我們承認自己的力量是非常渺小，然而集合無數無數的涓滴，不就可以成爲洪流嗎？倘不凍結魯迅的遺產，而根據歷史運動的真理和經驗去發展它，使它的戰鬥性和真實性發揮在一切方面，使我們的民族生活，革命事業和文化勞作格外豐富起來，結實起來，由魯迅的死所引起的民族損失，不就可以因此逐漸補償嗎？今天，誰都不能否認魯迅是不朽的，然而要使魯迅的不朽性爲我們所有，除了繼續發展魯迅外，別無其他便宜辦法。

現在到了我們該對魯迅作全面研究的時候了。我們並不幻想一切都對他有一致認識，魯迅的怨敵和魯迅的衛士，根本就不可能用同一的尺度來測量魯迅。然而，在魯迅的衛士中間，對於魯迅作統一步伐的研究，那不但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可能的。

但自然，統一的研究並非用一套刻板公式去加上魯迅頭上，那是斷然研究不出什麼來的。魯迅是公式主義的最大敵人，他的思想和藝術，絕無教條臭味。凡能真正道破客觀真理的思想家與藝術家，都善于最具體地最深刻地表現歷史的動態，魯迅正是其中一個典型。我們所要學習所要發展的，恰恰就是魯迅在思想和藝術各方面的具體性和深刻性。

從魯迅逝世以來，我對於這個文化巨人的遺作，是日益增大了閱讀興趣。我比過去任何一

個時候，都更深切地感覺到，魯迅是每一個青年所不可少的導師。以前爲我匆匆涉獵過的魯迅作品，現在不斷在我面前跳出了許多爲我先前所未發見的真理，它們把我引到了思想的巔峰，把我帶到了歷史的深谷，我不能抑制住自己的興奮，於是動了研究魯迅的念頭。我曾把自己對於魯迅的認識寫在幾篇專論中，其中較長的，爲思想家的魯迅（一九三八年作，是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的，那是魯迅座談會討論魯迅思想的結果，我不過是一個論文執筆人，所以署名『魯迅座』）魯迅的思想遺產——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，啓蒙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的魯迅，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魯迅（以上均發表在一九四〇年底，是用以紀念魯迅誕生六十周年的。）後三篇彼此間有聯繫，所以結集成爲一本較有系統的專論魯迅思想的小書，而最早發表的一篇則刊在書後作爲附錄。現在，我把這書作爲一份小小的祭禮，獻給逝世已經四周年的魯迅先生，同時也用以紀念他的誕生六十周年。我並不以爲他有什麼在天之靈，希望他含笑領受我的禮物，我最大的願望，是對這巨人的思想多少作了一點並不歪曲的解說，以加深學習魯迅，研究魯迅的運動。自然，我還奢望這小書能夠在保衛魯迅，發展魯迅的鬥爭中盡一點哨崗作用。

魯迅不僅是一個思想家，也是一個藝術家，本書專論魯迅思想，而很少涉及他的藝術，那是因為我對於藝術完全是一個門外漢的緣故，如其時間容許我將來附帶學習藝術，我或許能夠對魯迅作一個較為全面的研究吧，但現在，關於魯迅藝術的研究，只能期待於專家了。

寫到這里，我的序文已經可以完結了。但一陣夾雜着感想的回憶忽然湧上我的心頭，還想趁此再寫幾句。

記得去年八月三日在一個紀念魯迅六十誕辰的紀念會上，我作了一點關於魯迅的報告，其中有一段論到魯迅與孫中山先生，大意和本書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段中所說的差不多。但不久我就在文陣叢刊中看到『我的朋友』之一，（這里所加的引號是用以標明這四個字有其歷史來源——例如章衣萍先生說：『我的朋友胡適之』——），而並不含別意。我要鄭重聽明，我所要提到的『之一』，真是不折不扣的我的朋友，發表了一篇關於魯迅雜想，那篇雜想開頭的一段是：

「魯迅還是魯迅。把魯迅比擬于孫中山大可不必（中略）以是而論列魯迅，未可謂爲知魯迅。」

善哉，魯迅之言曰：偉人一做了化石，那就無往而不被歡迎，偉大了。

魯迅先生必然憎恨那些以化石視魯迅的人。」

真是說得毛骨聳然。我立刻就聯想到了我在八月三日所發表的報告了，我當時的確將魯迅先生和孫中山先生一同論列過。「我的朋友」決不會無的放矢，他一定有所指。然而，翻讀許多刊物，都找不到他所要射的「的」，唯一可能或為他所指的「以化石視魯迅的」第一類嫌疑犯的，（尚有第二第三類，不在本文所說的範圍之內）舍我其誰。但我引為詫異的是，在我的演講中，那里來的「把魯迅比擬于孫中山」的怪論。想起來，大概是由于「我的朋友」聽到了不負責任的曲解或訛傳，于是根據此類曲解或訛傳判定我「以盤喻日，以柱喻象」（引自「我的朋友」的同一文）吧。在我們周圍，是常有這類好事者的，他們唯恐文化界沒有風浪，慣會摘舉別人的片言隻語，照自己意思曲解，卻要別人負起錯誤的責任來，倘因此激起一點文壇風波，就引為快意，因為他可以「觀鬥」。（更下流者還會造謠誣衊，亂放冷箭。）但自然也有人並無惡意，只因為一時的錯覺（聽錯或看錯），就把別人的說話或文字訛傳了，而實際上，被訛傳的言論當然同樣要無辜地負起錯誤的責任來。「我的朋友」所聽到的，還是好事者的曲解呢？還

是好意者的訛傳呢？我不得而知，但總之，他所聽到的，不是真實，而是走了樣的話片。在我引爲小的遺憾的是，他的那篇雜想，可能被某些好事者當作『餘興』來看。而他所下的斷語，也略爲過火了點，因爲即使有人把魯迅和孫中山相比擬（我很同意史達林對路德維希「此公會把史達林和彼得大帝相比」所說的話：『任意把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比擬，是很危險的。』因此，我不贊成這樣的比擬。）爲什麼就是『以化石視魯迅』呢？把偉人當化石來看的人，是要凝固偉人的一切，是要利用被他僵化的偉人來達到其自私目的，魯迅的確憎惡這樣的人。但如其有人把魯迅和孫中山相比擬，他雖然不對，似乎還不至于被歸入這樣的人物之列吧。我是敬重『我的朋友』者之一，我希望他以後下筆藏否人物論斷是非以前，多經過一番考慮。而實際上，『我的朋友』是評論高手，他的一時的疏忽，真是所謂『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。』而我希望他連這『一失』也給戒免掉，確乎近于苛求了。

然而我的本意卻不在苛求，也不在答辯。只因爲談到魯迅，而觸動了一二點從回憶中跑出來的感想，把它們記錄下來，就算是本書序文的一點『餘興』。好事之徒或許又可從這裏找到一點新的資料吧，但我哪里管得了許多！

平心

目次

自序

第一章 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

第一節 引言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節 魯迅的戰鬥現實主義的根源……………七

第三節 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主要內容……………一四

第二章 啓蒙主義者和民主主義的魯迅

第一節 魯迅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……………四

第二節 魯迅的啓蒙主義思想……………五

第三節 魯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……………六

第二章 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

第一節	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統一性	· 七
第二節	魯迅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要求爲什麼出發於國民性的解剖與批判	· 九〇
第三節	魯迅所擔負的民族自我批判的任務	· 九六
第四節	魯迅的反帝思想的發端	· 一〇六
第五節	由進化論跨向階級論	· 一七
第六節	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	· 一四九

附 錄 思想家的魯迅

第一節	怎樣研究魯迅思想的發展	· 一七〇
第二節	從清末直到大革命以前的魯迅思想	· 一七六
第三節	魯迅晚年的思想	· 二二二

第一章 戰鬪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

第一節 引言

一切偉人出現在時代的頂巔，適應歷史的需要，作為廣大羣衆的代表而戰鬪，而工作，從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看來，完全是一種必然。但是，某一個特殊偉大人物，剛好在某一時代，某一民族出現，以其特有的精力、品格和行動影響歷史，在史頁上留下一抹異彩，卻又是一種偶然。中國在封建宗法社會沒落過程中，在殖民地化過程中，在向新社會轉變的艱苦途中，必然產生適應民族解放需要的革命智識份子，並且必然從舊社會的游離份子中徵發積極敢為英容正直的特出人物，充任民族民主革命的旗手和參謀，最近二十年來大批智識份子投奔革命前綫，就是顯明的實證。然而，在這個歷史蛻變過程中，一個從舊社會和士宦家庭出身的智識份子，由于特有的遭際和修養，靠着出衆的天才與努力，憑藉文藝工作和思想活動，在許多同代的文人學者